

考察 SURVEY

# 下一个达沃斯?

莱茵河畔的施泰因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达沃斯,但它对世界的影响也许会更深远

文 许宏

在以举办论坛闻名的地方,达沃斯无疑是其中的典型。每年一二月间,世界经济论坛总会吸引国际舆论的目光。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扩展到阿联酋的迪拜、中国的大连和天津这样的新兴地区。达沃斯已不再仅是个地名,几乎是世界品牌了。

这都差不多是世界熟知的事情。不太熟知的是,一个未来的达沃斯可能正在兴起。这里要说的不是中国海南的博鳌,当然,那里的亚洲论坛早已有达沃斯的阵势。这个地方也是在瑞士,一个比达沃斯更小的城市:莱茵河畔的施泰因(Stein am Rhein)。

正如名字显示的,这座城市在著名的莱茵河畔,就像达沃斯在著名的阿尔卑斯山当中。跟达沃斯不同的是,莱茵河畔的施泰因不像达沃斯那样为世界所知。自1971年迄今,世界经济论坛及其前身欧洲管理论坛已经在达沃斯举办接近40年了。即使在之前,达沃斯已进入国际视野,那里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城市(1560米),早就欧洲人的滑雪和疗养胜地。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人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Der Zauberberg)就以那里的疗养院为背景。

位于德国和瑞士交界的莱茵河畔的施泰因是个仅有3000多居民的城市,距离金融之都苏黎世大约一小时的车程。部分由于收入更高的吸引,有些邻近的德国人到此工作。除了一个城门遭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误炸,这座城市被认为是全瑞士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小城。如果天

气晴朗,从小城北面山上的城堡,可以极目远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然而跟世界众多名城相比,它基本上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就像那里的风景一样安静。

这一切的平静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有所改变。2008年9月,莱茵河畔的施泰因举办首次“下一代领袖研讨会”(Stein am Rhein Symposium for Leade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这个名字有些像达沃斯旗下的全球青年领袖论坛(Young Global Leaders Forum)。所谓“下一代领袖”,是论坛组织者和顾问从全世界的商业、科学、政治、文化等领域推荐出的年龄大约在35—40岁之间的从业者。使得这座中世纪的小城跟当代世界的脉搏联系起来的是—群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曾经在世界最大制药企业之一的诺华公司(Novartis)前身巴塞尔化工(Ciba)工作过的罗伯特·格内穆(Robert Gnehm)出生在莱茵河畔的施泰因,这位化学家在20世纪初担任瑞士联邦工学院院长,聘请过爱因斯坦为学校的物理教授。在他去世几十年后,格内穆家族的后人向家乡捐款致力于修缮和保护古城,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自己的家乡成为文明传承交流的地方。

他们邀请瑞银集团组织发展部的首席执行官舒恩伯格(Toni Schenberger)、瑞士卫浴制造商吉博力公司(Geberit)的董事长凯尔姆(Günter F. Kelm)、苏黎世大学医学家珂加特纳(Hans Hengartner)还有小城的市长霍斯特曼(Franz Hostettmann)担任论坛基金会的成员,他们也邀请诸如前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雷蒙德(Steve



Reinemund)和前《时代》周刊记者现任美国帕特里·亨利学院历史学教授的艾克曼(David Aikman)作为论坛顾问。

虽然时间尚短,莱茵河畔的施泰因已经表现出一些不同于达沃斯的特色。就像地方本身就不如达沃斯那样的著名,莱茵河畔的施泰因论坛也不走明星路线——尽管巧合的是,施泰因研讨会的英语缩写是“明星”(stars),就看如何理解明星的意思了。从出资方到组织者和顾问团,都没有哪一位被凸现出来作为明星人物,这跟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给世界的印象非常不同。已经举办的两届年会上,无论是演讲人还是被推荐出来的所谓“下一代领袖”,也都不像达沃斯或博鳌论坛那样是世界名人的聚会。即使也有雀巢、索尼、瑞士信贷董事长这样的演讲者,会议的气氛更像是大学研究院或社会大学的课堂,焦点不在领袖的光环,而是对问题的看法,是五六十岁的人跟三四十岁人的交流和建议以及他们各自之间的沟通分享。

规模不大可能是让这个论坛类似学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每年的会议只有大约80位“下一代领袖”和20位演讲人参加。几天的会议期间,小组讨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包括每一顿正餐时的交流,组织者尽量安排每一次小组的成员都是不同的,演讲人分散在各个小组,这使得与会者能在短短的几天中认识更多人。组织者很重视加强与欧美社会之外的交往。担任论坛顾问和论坛主持人的瑞银组织发展部执行总监古普塔拉(Prabhu Gupta)就是印度



裔。经过两次年会，他们也越发认识到中国的变化非常值得深入理解。但是目前，无论是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来自中国人的声音都还很不能够反映现实的情况。他们在2010年1月专门访问中国，为论坛未来的人选、话题和活动进行考察。

## 发达之后的发展

有些难以想象，这些刚刚起步的工作是在被世人普遍认为早已进入所谓发达社会的瑞士。施泰因研讨会更像是当今的新兴地区在社会开放之后寻求进一步发展而做的事情。对于新兴地区的未来，这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样本。发展是个长期的事情，即使如瑞士莱茵河畔的施泰因这样经历了几百年相对和平与稳步发展后，不能让时间停下来的人们还是要面对如何继续生活的问题。2007年是莱茵河畔的施泰因建城1000周年，在1001周年的时候，这座古城开始走上跟当代国际世界交往的新时期。

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施泰因研讨会结束之后众人彼此告别的时候，主持人古普塔拉送给与会者每人一个名叫《不仅是巧克力和奶酪》(More than Chocolate and Cheese)的DVD光盘。里面讲述的是瑞士如何成为瑞士的故事，尤其讲到瑞士国旗的图案为什么是十字架，而且还追溯了十字架的来源。这个小小的举动可能正体现了施泰因研讨会跟当今很多国际论坛最不相同的地方，它在谈论诸如经济危机、亚洲兴起、新技术新能源、环境

保护这些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时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是鼓励人们进一步思考，思想面对和解决这些全球问题时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需要怎样的价值观，怎样的信仰，怎样的智慧。

被组织者邀请来的演讲者在相当程度上持有类似的关注。马勒克(Theodore Roosevelt Malloch)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曾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做过咨询工作的学者正在世界最大的学术基金之一的坦普敦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资助下研究信仰与商业的关系。他的新书《精神企业：做高商的生意》(Spiritual Enterprise: Doing Virtuous Business)和《节俭：一个被遗忘了的美德的重生》(Thrift: Rebirth of a Forgotten Virtue)都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性。

跟一般呼吁提高人的素质的观念不同，这里的“精神资本”不是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的素质，而是引向有着另一个维度的生存状况：诸如勇敢、耐心、坚持、自律、怜悯、宽容、感恩、谦卑这样的“精神资本”是人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从上帝的恩典得来的结果或副产品。在这样的维度下，面对和解决即使像环境保护这样棘手的问题并不是通过人的智慧和爱心，而是寻求上帝的怜悯和恩惠，承认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解决世界问题的道路不是被创造者能够完成的，而是顺服创造者的意愿。

还有一位演讲者是美国商会主席米利根(Robert S. Milligan)，他除了经营自己的

肉食加工公司和参与领导美国商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联合会，还带领一个在职场上推动信仰交流的国际组织。另外，在2005年被评为全球20位最有影响管理思想家之一的迪克森(Patrick Dixon)也是研讨会的主要演讲人。这位英国医生在1987年出版的《艾滋病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AIDS)预言了艾滋病在世界的蔓延。他和他的家人都积极参与信仰组织的推广工作。而前面提及的论坛顾问前百事首席执行官雷蒙德和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教授阿克曼也都是在工作生涯中强调信仰的重要而为人所知的行业领袖。

在如今对上帝的信仰比较衰落的欧洲，施泰因研讨会对信仰的看重是少见的。这多少显示了有些欧洲人对现状的不满，有点像达沃斯论坛在最初创办时的意思，当时欧洲管理论坛的举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欧洲在公司管理方面跟美国同行的差距。在信仰上，美国和欧洲自当初北美殖民地建立以来就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世人看来代表新兴世界的美国却在整体上比欧洲远为看重对上帝的信仰。

当然，施泰因论坛上的信仰因素并非形式上的，如果对此不很了解也不太敏感的人也许感觉不到施泰因跟其他的国际会议有多少不同。然而，与众不同往往就在于这些细致和微妙之处。对于考察世界的变迁，特别在所谓全球化继续席卷世界各地的时代，能否察觉细微之处可能越发重要了。未来的重大变化，也许就在这些细微之处了。G